

第一章

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大學理念與 大學教育：問題與對策

一、引言

人類歷史進入第三個千年紀元之後，戰後世界歷史主流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趨勢更加速發展。二十一世紀歷史的重要趨勢如高科技的發展、知識經濟的形成，以及文明之間的對話，都與「全球化」有關，而且直接衝擊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的轉型。

本章的主旨在於分析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的新展望，特別針對(1)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霸權與本土文化認同問題，以及(2)全球化時代中「教育主體性」的失落問題，籌謀對策。我們主張二十一世紀的大學教育應重視本土文化認同問題，加強本國文化教育，並回歸教育本位推動大學教育，才能在二十一世紀科技與經濟發展的洪流中，站穩教育的立場，開創新局。

2 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強調大學的「理念」及其「實踐」兩者之間，既有其不可分割性，又有其創造的緊張性。所謂「不可分割性」，是指任何大學的實際運作如果沒有清晰的理念，必然因缺乏指導原則而迷失方向。反之，大學理念卻也只有落實在具體的大學建制之中，才能使它自己充分實現；所謂「創造的緊張性」，是指大學理念有其理想性格，而大學教育有其現實面向，兩者之間在具體而特殊的時間與空間條件之中，常常不能免於緊張關係。但是這種緊張關係卻又深具創造性，因為高遠的大學之理念可以提昇大學的水準，而大學的實際教育狀況也可以使大學理念更具有方向感，兩者之間互為創造，合之雙美，離之兩傷。

二、全球化時代大學面對的新問題（一）： 霸權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爭衡

在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中，(1)「全球化」趨勢催化了「解民族化」與「解疆域化」的效應。(2)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大學所面臨的第一個新挑戰，就是：本土文化如何與強勢的霸權文化爭衡之問題。這個新挑戰使大學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激盪中進退失據，捉襟見肘。我們詳細闡釋以上這兩個論點。

(一)「全球化」的效應及其對大學的挑戰

「全球化」是二十世紀持續發展的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蔚為歷史主流，最近二十年來隨著通信科技的飛躍發展，而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重要方向。「全球化」趨勢表現在許多具體現象之上，例如「時間」的全球化表現在全球各地股票金融市場的緊密互動之上，資本的全球化表現在全球各地資金之快速流動之上，知識的全球化表現在擁有新知識的人才之自由流動之上。但是，正如當代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全球化」趨勢的效應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是所謂「解民族化」。貝克曾區分「第一次現代」與「第二次現代」，「第一次現代」的前提是「國家－政治對空間的固定和統治」，貝克說：¹

領土國家成了社會的貨櫃。換言之：國家的權力和控制要求建立且塑造了社會。對於民族國家在不同的基本權利、教育制度、社會政策、多黨政治風貌、財稅、語言、歷史、文學、交通路徑、基礎結構能量、護照和邊界管制等各方面的優勢地位，我們可以而且必須考慮和想像。藉此方式，民族國家社會也產生和保存了每日生活中的準本質認同，此種認同的自明性似乎建基於同義反

¹ 貝克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90-91。

4 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

覆的表達形式上：德國人生活在德國、日本人生活在日本、非洲人生活在非洲。在這樣的視野下，「黑色猶太人」和「西班牙德國人」（這僅僅是舉一些世界社會中十分平常的混雜狀態）被視為極端和例外，也就是被視為威脅。

在經濟、政治、生態、文化、生涯史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上述存在於國家社會空間和認同中的思想、行為和生活的建構崩潰了。世界社會意謂著，各種打破並攪亂政治和社會的民族國家正統性的權力機會、社會行動、生活和認知空間。

貝克認為「全球化」趨勢所創造的「世界社會」意味著「第二次現代」的來臨，也意味著民族國家的終結，²他稱這種現象為「解民族化」。

「全球化」的第二種效應是所謂「解疆域化」。貝克說：³

全球化不能只被理解為民族國家間交互關係與作用的增強與頻繁，事實上，全球化持續改變了社會的內在性質：

² 參考：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Mckinsey & Company, Inc, 1995)，中譯本：大前研一著，李宛容譯：《民族國家的終結：區域經濟的興起》（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 22。

³ 貝克：前引書，〈中文版序〉，頁 4。

約定「社會」、「政治」之架構，本身就有了問題，因為疆域原則成了可疑的原則。更精確地說，假設的國家與社會等同關係被打破和解除了：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的貿易、工作和生活形式，不再於依國家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容器」中進行。

因此，全球化的核心可被視為是社會的解疆域化。經濟、政治和生活形式不僅可跨越邊界威脅古老的民族國家，它們也改變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凝聚狀態。越來越多的事情不但是同時發生，而且還發生於同一地，而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未曾對距離的萎縮作出準備。世界突然變得緊密，不是因為人口的成長，而是因為某一些文化效應似乎必然會使所有的陌生者及遠方彼此接近。

貝克所謂的「解疆域化」的效應，確實出現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不同領域之中。這種「解疆域化」的作用，一方面使既有的國家、機構或團體的界限與支配力為之弱化，另一方面卻也使得世界各地的緊密感大大加強，使全球各地之間的互助支持愈形重要。⁴

⁴ 所以，大前研一（日本），赫伯特·寒哲勒（Herbert Hensler）（西德）和佛瑞·葛律克（Fred Cluck）（美國），就在1990年2月8日在紐約舉行的貿易與競爭能力會議提出〈邁向2005年世界的互助互立宣言〉，強調：「人類社會與經濟制度，其安全之所繫，不再靠超級強國的嚇阻力量，而有賴於國與國之間經濟與知識思想上的互助互立」。這份宣言收入：Kenichi Ohmae,

但是，「全球化」趨勢所產生的以上這兩種效應，對二十一世紀的大學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使世界各地大學的教育內容與品質都因捲入「全球化」的浪潮，而必須面對全球性的競爭。舉例言之，各國許多大學爲了爭取「世界一流」的學術領導地位，常以重金禮聘著名學者前往任教，這種情況在若干全球競爭激烈的學術領域如半導體元件設計、基因體醫學、奈米科技等更是如此，由於這些領域中研究成果的突破可以創造巨大的商業利益，所以，世界著名大學莫不投入重金禮聘人才。其影響所及，遂使一流研究人才加速流動，因各國大學爭相延攬而奇貨可居。同樣地，各國大學爲爭取第一流學生前往就讀，以厚植大學永續領導地位之基礎，也常以優厚獎金等條件，吸納青年學子。

那麼，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大學競爭的語文工具是什麼呢？答案無疑地就是英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英語的重要性與普及性隨著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影響力的上昇而日益增加，冷戰結束以後更是如此。英語在生命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與教學中的重要性，已毋庸贅言，即使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英語已經逐漸成爲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大學學術研究的世界

The Borderless World (New York: Mckinsey & Company Inc, 1990), 中譯本：黃柏祺譯：《無國界的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頁269-271。

共通語言。提昇英語能力，已經成爲非英語國家的大學基礎教育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的海峽兩岸大學，莫不致力於學生英語能力的提昇。

在這種高等教育發展的新形勢之下，大學就必須面對以英語爲基礎的西方霸權文化的宰制，以及如何在大學教育中延續本土學術文化命脈與傳承的問題。

（二）「全球化」與「本土化」激盪之下的大學教育

在「全球化」潮流之下，以英語爲基礎的學術文化確實發揮了霸權文化的作用，影響所及，非英語國家的學術評量指標多以論文收錄在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或 A&HCI (art & humanity citation index) 之多寡，作爲衡量學術表現的指標；本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某些學科之特殊的社會文化因素，以及以本國語言表達之方式，很少受到應有的考量。尤有進者，非英語國家之學者在英語學術典範的宰制之下，常運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對本國之人文社會問題進行檢證，於是，本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遂淪爲西方理論之非西方註解。

在這種西方學術典範支配之下，非英語國家的大學教育也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艱辛擺盪，甚至於輾轉呻吟。非英語國家的一流大學吸納全國的學術資源，培育出一批批的

精英人才出國留學之後，大半滯留在英語先進國家而「為他人做嫁衣裳」。日積月累，使這些人才的母國處於長期失血的困境之中而不自知。從許多大學的實際情況看來，非英語國家的大學教育之「本土性」教育內容確實常常屈服於「全球性」的現實考量之下。

但是，我們必須接著強調：所謂「全球化」趨勢，在很多情況之下，實際上是經濟上的富國將其支配力擴張到全球各地的一種發展趨勢。這種經濟的富國大多是政治與軍事的強國，也是能源消耗最多的國家。這種國家控制國際性的銀行及金融體系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等機構，也有能力主導國際性的資本市場，如號稱「經濟聯合國」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這種國家是高科技如資訊科技、航太工業、太空科技與生物醫學科技的領先國家，並且控制最先進的武器工業。這種國家常結合成為超國家聯盟，對其他國家進行干涉或侵略。於是，「全球化」趨勢常不免淪為為經濟及軍事的強國助長威勢的發展。在「全球化」的強力支配之下，弱國或窮國的大學教育常常不能免於在國際知識生產體系中，淪為下游知識工業的命運。這種地區或國家的大學教育對當地社會的貢獻不大，甚至完全背離本土關懷。

三、大學因應文化霸權挑戰的對策

我們在上節分析了「全球化」對大學的第一項新挑戰，那麼，我們應如何因應呢？因應這項新挑戰的對策甚多，(1) 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大學基礎教育應厚植學生之本土文化根基，使其紮根本國文化，創造其本國文化資源，才能從本土邁向國際。這項策略之所以必要，乃是因為只有大學教育尋求本土文化的靈根自植，才能建立學生的文化主體性，並開拓學生的價值意識。(2) 但是，這項教育策略也應避免流於文化的「部落主義」甚至文化的「自戀情結」。我們接著分析這兩項基本看法。

(一)「全球化」中本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正如上節所說，「全球化」趨勢其實對經濟的富國與軍事的強國大為有利，在多元文化競爭的表相之下，「全球化」助長了以英語為主的西方霸權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其對非西方國家的大學教育的直接衝擊，就是造成這些國家的本土文化認同的薄弱化或流失，使學生成為文化上失根的蘭花或漂泊的浮萍。

針對上項教育問題，就海峽兩岸華人社會中的大學教育而言，我們必須在大學基礎教育中加強本國文化的教育，才能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中各種文化系統激烈碰撞以及霸權

文化強力宰制之下，奠定海峽兩岸中華青年的文化認同之基礎。爲了達到這項目標，諸如「中華文化史」之類的課程在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大學基礎教育中，應特別加以重視。中華文化教育對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大學之所以是重要的基礎教育，乃是植根於歷史的不幸之中。讓我們從歷史的回顧說起。

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都經歷歷史性的劇變。就台灣地區而言，在戰後的經濟發展後，緊接著出現快速的政治民主化與社會自由化，促進了台灣快速的轉型；就中國大陸地區而言，經歷過文革十年動亂與浩劫之後，近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帶動了經濟（特別是沿海與江南地區）的快速發展，從而逐漸催化社會結構的轉變。海峽兩岸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化，必然影響未來中華文化的走向。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中華文化發展的方向何在？現階段雙方各自面對何種問題？應該如何因應？這些都是海峽兩岸知識份子與人民共同關心的重大課題。

二十世紀海峽兩岸文化發展的基本問題在於「斷裂」，所謂的「斷裂」有兩個涵意：(1)指文化領域與非文化領域之間的斷裂，而且前者的運作邏輯(*modus operandi*)受後者的運作邏輯的支配；(2)指文化領域內諸多組成要素之間的衝突。我們就海峽兩岸文化狀態加以探討：

從深層的文化史角度來看，台灣地區的文化發展仍潛藏許

多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1) 文化領域與非文化領域之間的緊張關係：現階段台灣地區的文化的第一個問題是：由於戰後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所導致文化領域的運作邏輯，深受經濟領域運作邏輯的支配與轉化。所謂「經濟領域內的運作邏輯」，是指在市場經濟的前題之上，以生產的效率作為基本考量。文化領域內部自己的運作邏輯應該在於文化理想之自我實現。文化領域的運作邏輯被經濟領域的市場經濟運作邏輯所掩蓋，造成文化領域自主性的喪失，其流弊所及導致文化創造力萎縮。(2) 文化領域內部諸元素互相衝突：戰後台灣地區的文化的內部還存在著諸多文化質素之間的衝突與不協調，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類：第一是中原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不協調。第二是國際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緊張。第三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對抗。以上三者之中，以第三項較具本質性，牽動前面二者的發展，其中中原文化與台灣地方文化之間的不協調，基本上是由於過去幾十年來政治結構與政策所導致；而國際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緊張，則是與最近幾十年來台灣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⁵

從台灣地區的現實狀況而言，由於資本主義的幽靈盤桓於寶島，所以我們看到台灣的文化領域與非文化領域之間也有一

⁵ 參看：Stevan Harrell and Chun-chieh Huang, "Introduction Change and Contention in Taiwan's Cultural Scene", in Stevan Harrell and Chun-chieh Huang,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1-18.

種緊張性，這就是文化領域受到非文化領域嚴重的宰制，一切事物都轉化成可計算可出售的商品。另外，文化領域之內諸多元素之間也有嚴重的衝突。

再從大陸地區的狀況來看，傳統中華文化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也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動。在 1919 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開始走向思想層面的現代化。自 1949 年起，近代西方重要思潮之一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大陸的官方主流思想。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的文化發展呈現兩種問題：(1)文化領域與非文化領域之間的緊張關係：首先是從 1949 年以後，政治支配力量的高度突出，以致於文化領域的運作邏輯深受政治領域運作邏輯與價值體系的支配，文化為政治而服務，這種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最為清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市場經濟在大陸地區飛躍發展，逐漸取代政治力而成為支配文化領域發展另一股新興力量。大陸地區文化領域的自主性，在「改革開放」的新階段中仍呈現臣服於非文化領域支配之下的狀態。(2)文化領域內部的問題：近百年來大陸地區的文化發展，在文化領域內部表現為兩種形態的「斷裂」：第一是傳統與現代的斷裂；第二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緊張性。這兩種類型的「斷裂」，在時間的進程中，交織為一，相互加強，使傳統中華文化在新舊交迭、中西衝突之中，艱苦備嘗。

從以上歷史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現階段海峽兩岸大學青年之所以與中華文化傳統產生強烈的疏離感，實在是「冰凍

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地的新時代裡，海峽兩岸的大學教育更應加強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引導大學生躍入中華文化歷史的洪流中，汲取新時代的智慧的靈感，以便在二十一世紀各種多元文化價值的激流衝擊之中，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培養價值判斷的能力，成為有本有源、頂天立地的新青年。

再從二十一世紀大學的學術研究來看，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與研究，也可以發揮極為巨大的學術能量。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我們可以發現：二十世紀海峽兩岸中文社會科學界中研究有關「國家」(state)、「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理性」(rationality)、「權力」(power)等議題的文化資源均來自西方經驗，而由於西方社會科學的支配性地位，將原是從具體而特殊的西方經驗中所建構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推廣而成為普世性的學說。在這種推廣過程中，西方學術「典範」(paradigm)實居於霸權之地位。

展望未來，二十一世紀中文學術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從西方支配走向東西互為主體。我們愈深入東亞歷史經驗與人文傳統，愈能夠出新解於陳編，愈能夠提出新的社會概念與命運，而與西方的同事進行富有啟發性的對話。中國學術如果愈能參考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方法，就愈能夠開拓新的視野，社會科學與中國學術本來就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為了達到這項學術研究的理想目標，大學教育中加強有關中華文化傳

統各個面向的教學與研究，實在是當務之急。

(二)「文化唯我論」的超越

我們以上所提倡的中華文化教育，不應被誤解為，我們有意鼓吹「文化唯我論」。所謂「文化唯我論」(Cultural solipsism)的心態，認為普天之下的不同文化系統中，以自己的文化最為先進而優越，其他文化皆落後而低劣，近代以前中國將四鄰形容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就是這種「文化唯我論」心態的表現。古代中國典籍中「中國」這個詞彙之涵義很能顯示我們在這裡所謂的「文化唯我論」，當代學者王爾敏(1927-)曾詳考先秦典籍中出現「中國」詞稱者共 25 種，歸納諸書所載「中國」詞稱之總數，共為 178 次，其所含意旨，約有 5 類：(1) 京師之意，凡 9 次。(2) 國境之內之意，即所謂國中，凡 17 次。(3) 諸夏之領域，凡 145 次。(4) 中等之國之意，凡 6 次。(5) 中央之國之意，凡 1 次。其中佔最大多數者，則為第三種以諸夏領域為範圍者，佔全部數量 83%。其次指為國境之內者佔 10%。再次指為京師者佔 5%。王爾敏指出：「在秦漢統一以前，『中國』一詞所共喻之定義已十分明確，主要指稱諸夏之列邦，並包括其所活動之全部領域。至於此一稱謂之實際含義，則充分顯示民族文化一統觀念。諸夏列邦之冠以『中國』之統稱，主要在表明同一族類之性質與同一文化之

教養之兩大特色。」⁶古代典籍以「中國」一詞指文化最高的諸夏之領域，「中國」一詞確實在相當程度內呈現某種「文化唯我論」的思想傾向。

我們現在提倡的中華文化教育，並不是以上述的「文化唯我論」作為基礎，也不是導向文化的「自戀情結」為目的。相反地，我們著眼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發展浪潮中，非英語國家的文化傳統在英語霸權文化的沖刷之下，頗有瀕臨崩潰之危機，從而使得非英語社會的海峽兩岸華人社會中的青年，逐漸失去本土文化的認同感。我們的論述實有其特定之針對性，我們認為：提倡本土文化教育，必須超越狹隘的文化義和團心態，才能從深具地域特性的本土文化中，提煉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使本國青年不致在霸權文化的衝擊中慘遭滅頂。

四、全球化時代大學面對的新問題（二）： 教育主體性的失落

全球化時代大學面對的第二項挑戰是：教育主體性受到嚴

⁶ 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作者自印，1977），頁 441-480，引用統計數字見頁 442，引文見頁 443。

酷的壓抑或扭曲，因為（1）高科技的進步以及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新發展，及其所產生的巨大利益，（2）使大學的性質產生重大變化，造成大學的「自我異化」，使大學之教育主體性日趨萎縮。我們接著論述這兩項論點。

（一）科技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二十一世紀是科技飛躍發展的時代，一般認為奈米科技、生命科學及通訊科技，是二十一世紀新科技的主流，世界各國莫不投入大量研發經費以加速在上述高科技領域爭取領先地位，以提昇國家經濟力。舉例言之，2001年哈佛大學宣布投入20億美金，針對幾個熱門領域建構五個研究中心，其中將7億美金建立Center fo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CGP）及Center for Imaging and Mesoscale Structures，結合生物、化學、數理統計、電機資訊以及工程設計，發展新技術並用於大規模的分析基因及蛋白，以研究細胞及生理功能。此外，加州理工學院也投入10億美金，從事生物醫學相關領域研究。

在這種國際科技競爭的新潮流中，海峽兩岸也急起直追，台灣的國科會於2001年6月22日，正式核定「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該計畫將分為基因體醫學組等四組，並從2002年度起執行三年，經費合計新台幣74億8千零7萬元。中國大陸從1997年開始推動973計畫，第一階段5年累計投入資金25億元人民幣，共有一百多個科研項目。973計畫2002年將再投

入資金 7 億元，增加安排 20 個項目。973 計畫的戰略定位是：根據到 2010 年以及本世紀中葉中國大陸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的目標和任務，圍繞農業、能源、信息、資源環境、人口與健康和材料等領域持續發展中的重大科學問題，開展創新研究。973 計畫的 108 個項目，農業領域 14 項，能源領域 12 項，信息領域 14 項，資源環境領域 19 項，人口與健康領域 17 項，材料領域 16 項，重要科學前沿 16 項。

以上這種科技快速發展的新趨勢，說明了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所謂「知識經濟」的新時代。相對於過去歷史上以土地為生產工具的「農業經濟」，以及以資本與設備為生產工具的「工業經濟」，二十一世紀以知識作為創造及累積財富的工具，一般稱之為「知識經濟」。「知識」在二十一世紀成為創造財富的根本基礎，這裡所謂「知識」不僅包括科技研發的新知識，而且也包括經營、管理、傳播的新模式與新方法。

（二）大學的教育主體性面臨挑戰

以上所說的科技發展及其所創造的巨大的經濟利益，對大學所造成的衝擊在於：大學理念與大學教育必須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而有所調整。一位管理學家提出以下的觀察：⁷

⁷ 李誠：〈高等教育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功能〉，收入：《知識經濟時代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救國團社會研究院，2002），

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教育應從精英教育轉變成普及教育，因此大學教育的角色應從提供學生知識與技術轉變成營造有利人力投資環境者，把學生從被動性的學習轉為主動的人力資本投資者。要達成此目的，大學必須從開發各種不同才能方面著手，使看似很普通的學生透過各種才能的鑑定，發現他的特殊才能的所在，因而能因材施教，使大多數的就業人士都可以成為具創意、具專業知識與技術的知識工作者。大學經營的理念與方法亦該在知識經濟時代作一個徹底的改變，從一個被動的，以考試與頒發文憑的方式去迫使或檢驗學生有無學習得某些知識與技術，到一個主動的創造有利的誘因，提升學生從事人力資本投資的報酬，使他們從一個被動的知識接受者，到一個主動的新知識、新技術追求者，人力資本投資者。

這種說法完全切中知識經濟對大學之影響在於：使大學生成為新知識與技術的追求者與人力資本的投資者。大學的性質也隨之轉化成為知識經濟體系中新知識與新技術的研發工廠。

就海峽兩岸大學教育的狀況而言，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許多大學常扮演國家意識形態生產工廠的角色。相對於過去大學所

肩負的意識形態任務而言，二十一世紀的大學轉化為新知識與新技術的研發工廠，雖然也許可以視為一種進步的現象，但是，如果從大學之為教育機構這個立場來看，則大學在二十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中，將面臨「教育主體性」失落之危機。所謂「教育主體性」是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教育活動而促成學生人格之完整發展，從而增進學生之道德福祉。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當令的新時代裡，知識之商品化價值普受重視，有些人甚至以知識作為商品。於是，大學中知識的生產（如研究）與傳播活動（如教學活動），逐漸與這類活動之目標產生疏離現象。換言之，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活動，由於知識經濟與市場需求等因素的介入與操弄，而演化成為大學教研目標的對立物。其結果是使大學終於與大學之目的互相疏離，而造成大學的「自我異化」，從而使大學成為完成其他目的（如市場經濟的擴張）的工具，使大學的「教育主體性」為之淪喪。

五、大學重建教育主體性的策略

針對上述第二項新挑戰，處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大學，（1）必須回歸並重建大學之教育主體性，才能消除大學的「異化」之危機。（2）大學挺立教育主體性的策略尤在於（a）將教學與研究之目標落實在學生之上，（b）並在大學社群與非大學社群之間建立「互為主體性」之關係。我們接著闡發以上兩項看法。

(一) 大學「自我異化」危機之解消

我們要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籌謀解消大學「自我異化」之對策，首先必須探討所謂「大學之自我異化」的具體涵義，約可從三個方面思考：

第一，所謂「大學之自我異化」，是指大學與大學師生心智勞動的成果互為疏離。舉例言之，大學師生研發的生物技術知識，一旦研發完成，這種知識就脫離其心智勞動者，常經由知識商品化的管道，而流入大資本家所擁有的大藥廠，生產新藥，創造龐大商機。我們舉此一例以闡明：大學師生常常並不是他們心智勞動成果的最後受益人，在很多情況之下，大資本家比大學師生更能將大學的勞動成果加以商品化，從而壟斷其所創造的巨大利益。於是，大學乃出現「自我異化」。

第二，所謂「大學之自我異化」，是指大學通過其教研活動，而成為大學自身存在之本質的對立物。再舉上述生物科技為例說明。大學存在的本質是為了個人道德福祉的提昇與人類文明的創造與永續發展，但是，大學師生在大學中的教研活動，卻有可能將研究成果使用為毀滅人類福祉的工具，例如數年前台灣某大學畢業的藥學博士，在從事博士後研究時，使用教授的實驗室設備生產毒品，就是一個轟動社會的新聞。在上述情況之下，大學已疏離於大學的本質之外。

第三，所謂「大學之自我異化」，是指大學作為知識社群而與其他社群處於互為疏離之關係，而淪為被其他社群所宰制之狀態。大學本是大社會的一部分，大學與社會中其他社群或成員，應處於一種「互為主體性」的關係。從一方面看，大學既不是也不能成為遺世而獨立的象牙塔；但從另一方面，大學卻也不能完全受市場經濟的運作邏輯所宰制，而成為經濟部門的知識工廠。然而，在某些狀況之下，大學有可能淪為其他部門或社群之工具而「自我異化」。

針對以上所說三種意義下的「大學之自我異化」，其解消之方法在於使大學回歸以教育為本位之本質狀態。

（二）「教育主體性」的重建

所謂大學的「教育主體性」之重建，是指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快速發展的新時代中，大學必須明辨本末，將教研工作之目標落實在學生之上。大學的研究成果固然可能創造龐大商機或新的意識形態，但是，大學存在之原初目的，並不是為了市場經濟的擴張或國家政治目標的完成。大學的教研工作都以學生心智與人格之成長為原初起點，也是最終目標。

如果大學能重建這個意義下的「教育主體性」，在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中，大學就有足夠的內在力量，以便與社會力、政治力及經濟力健康互動，雙方建立一種「互為主體性」之關係。

誠如前任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校長都德斯塔（James J. Duderstadt）最近所說，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變遷快速的時代，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力量正強而有力地衝擊著大學的教學與研究的內容與議題。他以密西根大學為例，頗為擔心美國的一些研究型大學無法因應快速的經濟變遷而成功轉型。⁸就二十一世紀的大學來說，也許關鍵不在於大學是否能夠成功轉型以因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需求，而在於轉型後的大學是否能夠成功站穩「教育主體性」的立場，保持並延續大學的理念。

六、結論

本章扣緊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發展的新趨勢，探討新時代大學所面臨的兩項新挑戰，也以海峽兩岸的大學為例，提出因應挑戰的對策。我們在本章第二節首先指出：由於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二十一世紀以英語為中心的文化系統之影響力與日俱增，而逐漸形成具有宰制力的霸權文化，因此，二十一世紀非英語國家的大學必然面臨本土文化如何保存並發揚的問題。我們認為：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愈加速發展，亞洲的大學教育愈應在基礎教育中加強本土文化的研習與傳承，才能厚植亞

⁸ James J. Duderstadt, *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洲文化圈中大學生的本土文化資源，使他們在二十一世紀強勢文化的衝擊之下，不致形成爲飄泊的靈魂或失根的蘭花。但是，我們也提醒，經由本土文化的浸潤而奠定學生的價值意識這項教育策略，並不意味著另一種形式的「文化自戀狂」教育，從而製造文化的或精神的義和團。我們認爲：只有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亞洲國家的大學才能在二十一世紀植根本土並放眼世界，真正實踐「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理想。

本章第四節分析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由於新科技如生命科學及奈米科技的突破，創造巨大的商機，使大學所創造的新知識之市場價值大幅提昇。這種新發展的結果有可能顛覆大學的原始目標，改變大學作爲追求真理的知識殿堂之性質，而造成大學的「自我異化」，使大學成爲教育的對立物，使大學徹底「自我異化」。我們在本章第五節主張：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固然不應也不可能是遺世而獨立的象牙塔，大學師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但是大學卻也不是爲了經濟創收而存在的利益共同體。二十一世紀的新大學必須與大學門牆以外的經濟部門，建構一種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所說的「不離不雜」的健康互動的「互爲主體性」的關係。（2002年9月22日初稿）